

第十章 1882 年的企业活动

一、近代企业投资由冷到热

郑观应 1882 年初加盟轮船招商局到 1884 年初离去,在这两年时间内他在招商局外的活动,远比他在招商局内的活跃和重要,他的这些活动完全从属于一个大的社会经济活动背景——1882 年至 1883 年以上海为中心的企业投资活动一起一伏的大波澜。这是对中国近代企业活动发展及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为代表的从事企业活动的商人的命运,有深刻影响的大事件。对于郑观应来说,这次事件的波澜起伏,最后竟将他从一生事业的峰顶抛至谷底。为了把握郑观应在此中行为活动的思想线索,首先对这次经济波澜发生的来由作一番检讨。

经济波澜的起端是上海社会对近代企业活动的投资态

度,在 1882 年发生了由冷到热的转折性变化。从 187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情况看,虽然近代企业活动的呼声在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社会舆论方面表现得相当热烈,但在近代企业活动的投资态度上,社会具体的表现却始终十分冷淡,这一点从招商局历年招股的情况中可以明显看出来。1874 年,即由唐廷枢、徐润执掌招商局的次年,招商局第一笔五十万两的招股计划顺利完成,而紧随其后进行的第二笔五十万两招股计划却连年受挫,一直到 1881 年,即投资热潮来临之前一年才完成,这其中还包括 1878 年采取了非常措施,就是每年规定的一分官利“股息以五厘给商,五厘存作续招新股之款”^①。社会对近代企业的投资冷淡,致招商局即使在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之前就对官款有很深的依赖性。据李鸿章称,光绪二年(1876 年)“局员挪借钱庄积至五十余万两,计随时应缴拆息九万余两,鸿章虑其势将不支,故于烟台定约后督同各司道台局赶紧筹拨官款五十万。”^② 社会对招商局投资冷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由于轮航业的激烈竞争造成经营状况不理想是重要因素之一。不过当时面临资金来源困难的并非招商局一家,旗昌轮船公司 1875 年间股票大跌,使其根本无法从中国社会吸纳新资金用以更新船队;至于太古轮船公司当时较少资金来源的困扰,原因则在于该公司更多地依赖于英国本土。

然而中国社会对近代企业投资冷淡似亦不可一概而论,

^① 《本局编年纪事》,《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年周年纪念刊》,第 48 页。

^② 李鸿章:光绪三年九月《论维持招商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 94 页。

比如与轮航业关系密切的保险业就另有一番气象。1875年招商局同人唐廷枢、徐润、陈树棠、李积善堂等人创立仁和保险公司自保船险,股本二十五万两,很快又“再集本二十五万,共五十万两”^①。至光绪四年(1878年),招商局江孚号任用华人张慎之为船主,“各洋商保险公司不肯保险该船所载货物”,^②唐廷枢、徐润“又再集本五十万,接办济和水火保险公司”^③。从此轮船招商局的船、货全部自保。仁和、济和保险公司在经济上与招商局保持着相对独立性,“资本全部存入本局,并委托本局为代理人。”^④仁和、济和能在招商局招股连年受挫情况下顺利地不断扩大资本规模,原因是其投资回报率可观。仁和初创时就有“生意颇旺,可得利三、四分”的局面,后来盛宣怀曾反复要求招商局应“以保险之利抵折船旧”,就是因为仁和有相当可观的高额利润。^⑤

仁和、济和的投资者还有刘绍宗、韦文圃、郑廷江、唐国泰等粤东商人,当时尚在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的郑观应也在其

① 《徐愚斋自叙年谱》,页三七。

② 《选译外国通商章程十条》,《郑观应集》,第576页。

③ 《徐愚斋自叙年谱》,页三七。

④ 《本局编年纪事》,《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第45页。

⑤ 郭嵩焘在仁和、济和均有股份,见《郭嵩焘日记》(四),第269、313页等。然当郑观应1880年邀郭嵩焘投资机器织布局时,他却反应十分冷淡。关于仁和保险公司丰厚的利润,张培仁《静娱亭笔记》中《西人集股之易》一文有具体记载,谓:“仁和保险公司计股本银三十五万两,按年给息一分五厘外,余俱存为公积。以年来生意平顺,获利较丰,即开拓新加坡、旧金山等处保险生意。利益渐多,复公同商议,除照本给息外,另派余利一分五厘。自光绪元年十二月起,至六年年底止,已共给息二十五万三千余两,而本局所派之余息尚不在内,其获利厚矣。”转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477页。

列。^① 整个 1870 年代华人自办的保险公司除了仁和、济和外还有五家。^② 这完全是由于这一行业的高额利润的刺激所致。中国社会对近代企事业的投资兴趣完全是受投资的回报率所决定,因而像徐润个人资金的绝大部分并未投向他所主持的资金匮乏的轮船招商局,而是投在房地产等私人经营方面。^③

论及近代企业投资回报率问题,必须提及招商局及其后所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官利”问题。唐廷枢 1877 年 9 月拟定的《开平矿务设局招商章程》,称“将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者花红二成,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④ 所谓“官利一分”,是按股本之百分之十发送股息,这显然与股分制企业按利润额分成发送股息,在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不过官利并不是为华人企业所独有的现象,它早就通行于西方商人在华创办的企业。如 1872 年怡和洋行创办华海轮船公司时也宣称:“所有本公司溢利,每年一结,先提官利一分。”^⑤ 华人企业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实际执行时,无论企业经营是否盈利,官利也照常发送。如招商局光绪二年六月第三届结帐时,“收支结余项下,除派股息官利一分外,计亏银三万五千二百余两。”^⑥ 1870 年代末筹建的企业在投入运营前就向投

① 《选译外国通商章程十条》,《郑观应集》(下),第 576 页。

② 《唐廷枢研究》,第 131 页。

③ 详见《徐愚斋自叙年谱》,页三四~三五。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七),第 131 页。

⑤ 转引自《唐廷枢研究》,第 175 页。

⑥ 《本局编年纪事》,《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第 46 页。该届官利结果是由次年的利润来冲抵。同前书,第 47 页。

资者发送官利。

官利安排显然有悖于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经营之道,但在中国近代民用工业初兴之际,为了吸收更多的资金却不得不作这样的安排。在《易言》(36)中,郑观应甚至提出以中央政府财政保证投资铁路的商人有五厘官利,所谓:“如民间有认造火车路者,特免其捐输,并保其五厘出息。如官利不足,每年由该省地丁项下扣足,以昭大信,而广招徕。”^① 并把此作为克服官与商间不信任的政策措施。官利的性质表明,在中国特定的情况下,私人对近代企业的投资一定程度上是以传统的借贷形式进行的,这是民用企业在官方干扰之外,另一种由商人本身造成的、从根本上限制企业经营资本主义化的因素。当然企业经营者也自有其苦衷,如唐廷枢、徐润等对官利问题就有过下述叙说:

该局开办之始,即议定商股按年一分,未便失信。是名为一体,转若加取一分之息。官息缓而损上益下,犹足示宽大之仁,商息减则有始无终,必更塞招徕之路。是以历年商股均照一分付息,即上年生意亏折,余利仅有五厘,该局仍筹给商息一分。本年结帐,亦仍照办。设局本意,重在招商,非万不得已,不可议减商息也。^②

① 《论火车》,《郑观应集》(上),第81页。

② 李鸿章: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论维持招商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95页。此段文字实是出于唐廷枢、徐润之意见,详见该文内容。

不过仍要正视经营管理者作为最大持股者,也是官利安排的最大获益者,唐廷枢、徐润等第一代企业经营者同样只注重投资的近期回报。

到 1881 年,招商局的经营效益颇佳,向投资者展示了可靠的资本回报。招商局光绪七年六月第八届结帐,“营业状况,虽以长江货运洋商争揽,运价跌减八折,然以国人顾全大局,装货挤拥。本届收支结余项下,除发股息官利一分,及拨付船栈成本折旧银四十五万两外,余留为添船之用。至股份则已照规定收足一百万两。”^① 另外官款也在按预定如期归还。总之,这一届实收股金十七万两,打破多年集资困境是有上述现实背景的。招商局开拓新航线及更新船队问题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提上议事日程,并逐步地付诸实施。^② 另一家洋务企业开平矿务局于 1881 年按期投产,日产煤达三百吨。而它在 1878 年开始筹建时,原拟集股八十万两,但截至 1878 年底,只集得二十余万两,因筹建资金不足,被迫修改了原定修造铁路运输煤炭的计划。但在有了现实业绩之后,开平矿务局集股形势大变,不但于 1881 年底招足一百万两股本,而且面值一百两的开平股票市场价格一度上升到一百五十两。^③

不过在 1881 年与 1882 年之间,企业集资有乐观局面的仅是有经营成果者,负荷着彭汝琮亏累筹建维艰的机器织布

① 《本局编年纪事》,《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第 49 页。

② 参见《中英轮船航运竞争,1872~1885》,《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第 555 页。

③ 参见张国辉:《论开平、滦州煤矿的创建、发展和历史结局》,上海中山学社主办:《近代中国》第 3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1993 年版,第 57~61 页。

局,以及经营困难拟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的津沪电报局,它们的集资情况及前景就并不乐观。但是,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两家有影响的近代企业的成功形象毕竟具有影响舆论的作用,它们对商人投资的吸引力,为1882年中出现的普遍的企业投资热作了适时的号召。

1882年间社会对企业投资态度的转变,在近代企业活动本身的影响作用之外,还有更广泛的经济背景因素。1880年代初,整个中国经济笼罩在北方数省连续多年的特大灾荒的阴影之下,加之西北的连年用兵,政府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留下巨大的财政缺口;^① 社会方面传统的商业经营领域,如手工业、盐业、典当业等都进一步的萎缩。1882年刚出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对苏南商业竟发出如此感叹:“市廛百货翔贵,贸易获利殊艰,因此闭门歇业,或赴各繁富口岸,别觅生理,或径出洋营利。”^② 从积极参与织布局创办的蔡鸿仪、龚寿图等官绅和李培松等盐商出身者身上,已经可以看到原以传统商业为领域的投资经营者在主动地寻求新的投资领域的动向。至于与口岸相联系的外贸商品经营领域,当时也陷于长期不景气的困境,如1880年《申报》就织布局招商事对商业形势作过如此评论:

① 如沈葆楨在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之后态度有所转变,其主要原因就在两江财政的局促,所谓:“苏藩库、淮运库均尽收尽放,从无存留,绝不料江南财赋之区贫脊至于如此。”光绪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江苏饷源日竭兼酌剂折》,《沈文肃公政书》卷七,页二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辑》,文海出版社(台北),第1348页。

② 《左宗棠奏折》,《光绪朝东华录》,第1338页。

近时上海各项贸易莫不清淡,虽以丝茶两项为生意之大宗,而业是者无不暗耗明折。通筹迩来东南数省,所谓稳固可靠之利,仅有票盐及典当两事,然盐有票价之虚抬,典有火盗之不测,虽曰稳当尚未足以深恃。^①

在无论是苏南的传统商业经营领域,还是上海的外贸进出口经营领域都萧条和不景气的状况下,在苏南、尤其是在上海,社会上积存了大量的闲散资金,这就为投资热潮的来临准备了一定的条件。而在 1882 年初,上海首先出现了地价飞涨的势头,所谓:“屋宇尚未完,竟而巳有人租定者,有窗壁尚未齐全而巳有人搬入者。”^②

除了经济的因素之外,政治的因素也发生了作用。1881 年招商局内唐廷枢、徐润的地位出人意外地获得了巩固,招股集资也有了突破等等,在沪的西方人就此发表评论: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商人对这个企业渐有信心的表现。只要是官僚们控制着企业,这些商人总是有戒心的。现在官老爷们,有的离职了,有的不参预管理了,商人们才敢投资入股。^③

1882 年李鸿章对织布局的政策扶助,包括享有“独造权并免

① 《申报》1880 年 10 月 16 日。

② 《论本埠地贵》,《申报》1882 年 1 月 7 日。

③ 转引自《唐廷枢研究》,第 204 页。

纳子口税”等权益,也具有相同的社会政治意义。^①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官方,予企业投资的政策优惠和政治保护,尽管商人们对其政策优惠的长期性及稳定性仍持怀疑态度,但对李鸿章个人则已建立起相当的信任度。这从1881至1882年间郑观应的很多言论中,就可以感受到他对李鸿章的信任和好感。^②

总之,1882年中国社会对近代企业投资态度的转变,既有企业活动本身由多年酝酿到实践的自然规律,更有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综合积累的促动。

二、津沪电报招商

继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之后,在1882年投资热潮中有影响的企业是电报局。盛宣怀对1882年初津沪电报投资热潮的形成有这样的记录:

津沪电报之设也,始而人皆视为畏途,继而包定用款,生意略佳,适值招商各局股分增涨之时,人情乃视电报为奇货,近日富商大贾皆瞩目焉。以盼汉线、浙线之成,群起而愿附股,预订者已数十万,虽百

① 如《申报》1882年5月17日载《布局近闻》,内称织布局专造权及免厘税之请求获清廷准许,“本埠织布股分大有升腾之象”,“股价因是日涨也”。

② 见《覆津海关道郑玉轩观察书》、《致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观察书》,《郑观应集》(下),第779、780页。